

課程名稱：台灣建築史

開課老師：傅朝卿教授

開課年級：大學部

戰後初期現代主義建築

戰後初期之建築

1945 年起戰後初期之台灣建築，雖然有幾個比較明顯之風格，但事實上背後之各種因素是遠比其表象來的複雜錯綜。在初期整個政治方面完全以反共復國為主要方針，社經文化也是全面性的受制於政治導向之意識型態。建築的發展並不是自發成長之結果，完全是戰後其國民政府遷台復員及美援之直接或間接產物。其中雖然有東海大學建校所帶來之震撼與南台灣《今日建築會》及其成員對現代建築之推廣，因美援而來之現代建築、因道統關係而來之中國古典式樣建築、因大陸籍建築師來台而增多之布雜式現代建築及由日據時延續之西方歷史式樣可以說都是這種特殊時空下之產物。

美援建築之意義與角色

1948 年 7 月，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簽定「中美經濟援助協定」，美方答應提供二億七千五百萬給中國政府，作為各項經濟建設之經費，後來因為當年美方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聲明國共內戰只是中國內政問題不應加以干涉，而且在國民政府剛退守到台灣之初，美方也一直認為台灣遲早會落入中共之手，經援已無意義，所以援助一度中斷。1950 年韓戰爆發，台灣戰略地位倍受注意，美國杜魯門總統宣佈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對台灣的軍事與經濟援助也從 1951 年恢復，截至 1965 年援助中止，平均每年約有一億美元。

美援對於台灣的影響是多面向的，除了實質上之物資援助外，各種技術合作與開發亦廣泛的進行，同時美方亦鼓勵台灣的大學與美國大學進行學術合作與人材交流。以國立成功大學為例，該校從 1953 年起，就與美國以工科著名的普渡大學進行學術合作，由普大支援教授與顧問，協助改善教學內容與設備，成大也派遣教授前往考察。1954 年普大派遣土木系傅立爾教授（W.I.Freel）到建築系與土木系擔任顧問，同時美援基金所訂之美國建築雜誌則使當時台灣唯一的高等建築學院之學生得以適時的吸收到新的建築知識。

當然，美援帶來之經濟活動也直接影響到建築之發展，當時許多於建築界活躍之建築師如張昌華、虞曰鎮及關頌聲等人都作了不少美援相關工程。由於美援工程基本上均有美籍顧問，參與的本國建築師即使未曾學得現代建築的新觀念，至少也都學會了一套新的營建制度與嚴謹施工圖法，對於台灣制度化的事務所的形成有莫大的影響。除了學術交流之外，美援更以實際資金來協助台灣之大學興建校舍。成功大學建築系館（1957，葉樹源）、僑生宿舍（1958，賀陳詞）、圖書館（1957，陳萬榮、吳梅興、王濟昌）及第三餐廳（1958，賀陳詞）均是。這些建築在新公共建築不多的 1950 年代及 60 年代初期，實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成大圖書館這棟台灣 1950 年代最標準的國際式樣建築是為代表。此建築由普渡大學的顧問傅立爾教授擔任工程指導，整棟建築主要面朝北，隔著大學路與當時的行政大樓相望，可是建築卻未如行政大樓一樣作當時盛行的對稱處理，反而是順應機能採取非對稱的方式。主入口位於北面東側二樓，經由一大樓梯拾級而上，次入口位於北面西側一樓。這種一高一低，一東一西的入口處理是完全與傳統建築的處理方式相反，主從分明的表露出建築內部的現代機能。

在建築語彙之處理上，經由美籍顧問之指導，引入新的工程技術與觀念，較大跨距及懸臂樑之應用使得柱子內縮，整個正立面上可以大量開水平窗量，呈現出「空體」(volume) 這種國際式樣中最重要的特色。而使用不同形式之「版」，特別是中入口口形版框及主入口大樓梯，使建築之量體感降低，同時藉由版之構造使建築之表面可以出現輕巧且具有深度之造型，也是現代建築中常見的特色。

金長銘先生的建築教育

從 1940 年代末到 1950 年代末，正值台灣省立工學院轉型升格到成功大學的關鍵性時刻，學校整體的教學環境因受限於經費而不盡理想，但是建築系的前輩老師們卻在艱辛的系館中，努力地負起傳授建築知識的任務，也培育了許多優秀的人才。在早期的師長中，金長銘先生（1917-1985）是一位最為學生稱頌懷念的老師，雖然他於 1959 年（民國 48 年）因故離台，但十一年來在建築系所造成之影響卻是難以形容的。

金長銘先生為東北察哈爾宣化人，高中就讀南滿中學，1936 年（民國 25 年）前往日本就讀東京工業大學土木工程系。中日戰爭爆發後回國，1942 年（民國 31 年）畢業於重慶大學土木系建築組。畢業後起初留在重慶大學任教，後來至東北大學任教，民國三十八年（1949）隨國民政府來台即進入省立工學院任教。

由於受教育的背景，致使金長銘先生在教學上，呈現出兩種建築教育上的重

要脈絡，亦即從布雜到現代。金長銘先生於 1942 年（民國 31 年）畢業時，曾經當過譚垣先生之助教。譚垣先生係 1929 年（民國 18 年）畢業於美國布雜教育的**大本營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並於 1931 年（民國 20 年）任教於中央大學。由於戰爭期間中央大學搬遷至重慶沙坪壩地區與重慶大學為鄰，二所大學的教師相互兼課的情形非常普遍，譚垣先生自不例外，金長銘先生就是在這種涵構下，於譚垣先生處學得更多的布雜知識。在剛至台灣省立工學院任教的前幾年，金先生便是以布雜式的設計與投影學來教學，許多受教育的學生對此均有深刻的回憶：

那年第一次看到從重慶大學來的金長銘老師，在課堂上示範了布雜時代的水墨渲染法（rendering）。他們那種唯美主義的作圖技巧，真叫我開了眼界，也看傻了！從那時起，我第一次認識了「比例」以外的一些信息，這種唯美的信息，也啟發了我追尋建築的熱忱，可以說，我的第一步，是從這裡邁出去的。（方汝鎮，40 級）

通常他（金先生）在教室裡走動，看到同學佇著自己的草圖苦思的樣子，便叫同學起來，自己板凳一坐，默默地看著我們花上幾個晚上畫出來的草圖，然後要一張新紙蓋在草圖上，拿起你剛剛還在用的 6B 鉛筆，半描半改地開始繪出樑柱中心線的方格子。他的筆觸特別有韻味，原來並不怎麼起眼的東西漸漸生動起來。（吳讓治，46 級）

設計課之外，金長銘先生也教授陰影學，而且以熟練的技巧聞名，他對於此課非常的強調，自己編寫了一本圖文並茂的教材，認為：「建築是科學與藝術的綜合產品，所以不同於其他的工程是具有工程上的靈魂及美。因而它在科學上適應著人類的身心需要有永恆不斷的進步；在藝術上以莊嚴、雄渾、優美的氣魄樹立了牢不可拔的地位。而陰影學就是能幫助建築師將這工程上的靈魂，自己的意志及天才凸出的、立體的表現在紙面上，因此而有其存在的價值。過去，建築在我國一向不被人重視，以致培養的人才極少，對於所謂正宗方面的著述尚不多見，而這在建築上屬於左道旁門的陰影學更不會有人提及，但學校裡的學生在既無教材又乏參考書的情形下卻感覺到極端的困苦，因此個人在授課之餘，搜集了一些較重要的圖例加以新的解說完成此書，而本書中每一點，線的陰影自信都交代得清楚、俐落，並努力使令讀者能夠輕而易舉地了解一切則為我個人最大的期望。」除了教法與教材之外，金長銘先生亦使用布雜學院的評分方式，以「1st Mention」及「2nd Mention」的方式來給予學生作品成績，這些記錄也呈現於學生之作品之中。

金長銘先生在建築教育上第二個脈絡乃是現代建築思潮的引介及應用於實際設計作品之中。重慶大學於戰時曾為中國建築現代主義者之**大本營**。中國近代

建築發展過程中，最早極力引介現代主義建築的乃是創刊於 1936 年的《新建築》，此刊物於抗戰時停刊，後來亦於重慶復刊，由黎寧與鄭祖良擔任主編，二人都是現代主義的信徒，前者著有《現代建築》（1941）、《構成主義的理論與基礎》、《國際新建築運動論》與《新建築造型理論的基礎》（1943）等書，後者譯有《走向新建築》等書。金長銘先生身處其境必然深受影響，故而在 1950 年代即極力推介現代建築於建築學子，在當時布雜餘緒仍然影響台灣建築之環境下，宛如一股清流。至於金長銘先生自己於現代建築上的實踐，則可以台南電信局舊營業廳暨自動交換機房（簡稱台南電信局，1958）為代表，為當時台灣時空背景下所出現的一棟現代主義實驗性建築。

台南電信局負責整個工程的是基泰工程司，這個來自於中國大陸，與國民政府有密切關係的建築師事務所在 1950 及 1960 年代，設計承建了台灣許多公共建築。此建築委由金長銘先生設計的緣由乃是當時任職於基泰工程司初毓梅工程師之女初小平剛好就讀於省立工學院建築系，受教於金長銘，深覺其設計能力及熱誠，進而引介於基泰之故。如果與 1950 年代其他重要公共建築（如台北復興大樓，1955、台北包裹郵局，1957、台北台灣水泥大樓，1960），仍然多數以對稱及莊嚴的紀念性為考量相較，台南電信局在現代建築的實踐上，可以算是進步很多。營業廳的東立面，南側為虛面的大片鋼製玻璃窗，北側則貼以淺黃色的面磚。大片玻璃窗後，直通四樓的大樓梯清晰可見，這樣的處理如果是熟悉現代建築發展的人很難不把它和葛羅培設計的西德法格斯工廠（Fagus-Werk, 1911）做一番聯想，因為二者在角落的處理手法幾乎是如出一轍。

金長銘先生對於密斯「少即是多」（Less is More）之概念甚為推崇，認為與中國老莊思想無為無我之境極為吻合。另一方面，他將現代建築視為是一種等同於民主的建築而加以極力的提倡。金長銘的作品數目甚少，除了台南電信局之外，在台南市國民黨市黨部（1955）、台南市民族路林宅（1959，與王秀蓮共同設計）與台南市青年館（1961，與曾東波、李濟滄共同設計）中也都都可以見到金長銘先生對於現代建築的執著。在這份執著之下，並不意味著這些作品一定是十全十美，事實上我們在這些作品中也可以發現許多部份是屬於實驗的嘗試，鋼製大片玻璃窗即為當時剛被引介之材料。分期設計施工的營業廳與機房在造形的統合上也存在著問題，不過在當時仍然普遍性因襲的台灣現代建築發展中，金長銘先生的建築作品仍然算是實驗，但其成果是直接間接的影響台灣現代建築的實踐。以 1954 年（民國 43 年）省立工學院建築系 43 級畢業生所贈送給母校的標準鐘為例，就是一座非常具有現代主義思想的作品，設計者方汝鎮與高而潘兩位先生就都深受金先生之影響。

從 1949 年（民國 38 年）到 1950 年代中葉，雖然學校教學環境並不理想，但是建築系的前輩卻在這種克難困苦的空間氛圍下，在幾位老師的教導之下，成

就了建築的學習過程，而這些過程更建構了建築系六十年前半段非常重要的教育史料。其中，金長銘先生雖然於 1959 年（民國 48 年）因故離台，但十一年來在建築系所造成之影響卻是難以形容的。這事實可從學生的回憶中獲得證實。

「四十年代雖然缺乏教育師資，資訊也十分不完善，但同學們學習風氣非常旺盛，態度也謙卑熱誠、其原因不外乎生活環境清苦急於吸取知識充實學問加上金長銘先生古道熱心的教學方式對學生有相當的鼓舞作用。記得那時只有建築系的學生夜夜燈火通明，挑燈夜戰埋首於圖板之內，金先生也以教室為家，基礎理論、設計、改圖、上色無不傾囊相授，那時建築系好似築了一座城堡，眾望所向也是同學們的精神依歸。我們時常在黎明時分離開教室，晨曦中不難看出同學們臉上的倦容以及黑色的嘴唇，那時上墨時都是用嘴唇來調整筆尖的，現在想來倍感好笑也有無限的懷念之情。」（高而潘，40 級）

「那時對一個學建築的學生而言，很難想像到以後會靠建築來追求名利，因此許多老師如金長銘老師便把建築當成一種文化事業，以宗教獻身的理想從事建築教育，因此我對於建築也是抱著一種宗教獻身的學習，使我深深感覺到成大建築系那段艱苦的日子，才是令人懷念的。」（漢寶德，47 級）

「他（金先生）是把建築當成一個事業，一種藝術來追求，我們學生受他的影響遠超乎學校及系上所學。當時我們對建築的熱愛和理想的追求，也就是在如此氣氛下所培養出來。」（李祖原，50 級）

「金長銘在建築設計草圖修改上，展現出那筆觸的生命力，粗細濃淡終相宜，一個生澀的平面，在他修改下，輕輕的幾筆立刻變成成熟完美的佳品？記得有一次，夜深了，我們都畫累了，他就來一段西北大學的鬼故事，半夜宿舍廁所裡，來了一位美麗長髮的女鬼，令人驚倒，令人空盪迴旋，幫助我們消去疲勞的心神，金老師是所有老師中經常盤旋在我們身邊的難忘老師。除了設計，他還教我們透視陰影，尤其渲染功夫一級棒。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後來他在美國未能充分發揮所長；全家受困異鄉，令人發生疑問？學建築除了技術之外，是否還要機遇及一些謀略口才!？」（蔡哲芳，50 級）

「在成大創系的歷史中金長銘老師是影響深遠值得記述的老師之一，我個人還算幸運能接觸到“金長銘時代”的尾聲，金先生對早期成大建築系的影響，可以從國內外的學長口中轉述而知，幾乎無人不尊敬這位教學熱忱足為師表的典範。金先生之所以深植人心，不在於學問的深淵，而是他把自己的思想與其所長，能以非常親切而深入淺出的方法傳授給學生。特別讓人感佩者的是他有教無類的精神。在建築界，或多或少有設計掛帥之嫌，在當年貧乏的時代更為明顯，金先生本身是為教授設計的老師，其能夠讓資質優異的學生整天跟隨不足為奇，竟也能

讓功課資質普通的學生與之親近，那才是令人敬服者。課堂上的滿座證明他教學成功，而在他家裡經常有人滿為患的情形而言，如沒有出自內心的大愛，實在無法經久不衰的事實，是那段時期任何跟他接觸過的學生，甚至不是建築系的學生所共同敬愛的長者。金先生的確是當時建築系的精神堡壘，那時我雖未轉入建築系，但仍有機會去旁聽他的課，他常常陪學生晚上趕圖，常可以看見他穿梭在教室裡教學生或改圖，我也有機會隨高年級同學去他家分享當時的“建築系大家庭”的愉悅，到金先生家實在是另一種特殊的學生生活。金先生的家裡經常座無虛席，而師母與其子女也全無拘無束待學生就像一家人一樣。」(陳邁，51 級)

金長銘先生從台灣省立工學院到成功大學，一共在建築系十一年，幾乎以學校為重心，他與學生一起討論設計，指導學生設計，甚至與學生共同設計，讓建築系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家庭。1954 年（民國 43 年）東海大學舉行校園競圖，金長銘先生帶領李濟滄、隋洪林、潘有光與曾東波三位學生參加，榮獲了第三名的佳績，雖然此項競賽最後首獎從缺，但也証明了金先生的用心。為了推動台灣的現代建築觀念，金先生也與建築系師生共同台灣戰後第一份建築專業雜誌《今日建築》的編輯，但也因為此刊物被人誣陷，招致不白之冤，終至離開台灣前往美國，至 1985 年（民國 74 年）去逝於美國。

「今日建築研究會」與《今日建築》

1953 年（民國 42 年），台灣省立工學院建築系的學生李濟滄、華昌宜、潘有光、隋洪林、姚元中、方光虎與金長銘老師等人，構思成立一個團體，討論建築思潮，然而當時的政治環境對於結社限制甚嚴，因此阻力很大。最後在系主任朱尊誼與訓導長張駿五先生的支持與盧毓駿及黃寶瑜兩位校外教授的鼓勵下，於 10 月奉准成立了戰後台灣第一個建築研究組織「今日建築研究會」，經常聚會討論各種現代建築之問題，並且舉辦專題演講，對台灣現代建築之推廣，不餘遺力。而「今日建築研究會」更以柯比意的模矩人為標幟，闡明了對現代建築的追求。在當時建築學術相當困難，而且建築界充滿了復古式建築之環境下，「今日建築研究會」關心現代建築發展之舉，實有無比的時代意義。

1954 年（民國 43 年）元月，「今日建築研究會」克服了重重困難，創辦了《今日建築》，由該會之成員自任作者、編者與譯者。《今日建築》第一期是以鋼板刻寫油印發行 170 本，圖片則是用玻璃版照相晒藍圖後再加以剪貼，後來才逐期改善印刷品質。創刊之初，《今日建築》是純粹為台南工學院建築工程系之師生所辦，然而由於台灣當時並沒有很好之建築刊物，所以很快的成為台灣建築界共同注目之刊物。《今日建築》從創刊到 1955 年（民國 44 年）十二月停刊為止，雖然一共只出版了十一期，但是對於台灣現代建築之啓蒙與鼓舞，卻是甚為重大的。在 1950 年代初台灣建築還界還充滿著守成思想與道統意識型態之時，「今日

建築研究會」及《今日建築》推動現代建築之時代意義就格外的特別。這一群現代主義者之企圖心，在《今日建築》之創刊詞上寫的非常明白：

新的時代將有新的生活，新的思想，新的文化—那舊有的無論如何燦爛，總是屬於過去；新時代的人應當創造出自己的東西來，才無愧於祖先。

建築是思想的結晶，工程的產物，生活最明澈的鏡子，因此建築是時代文化的最具體表現物。.....

我們「希望」作為「日光」；「互勉砥勵」作為「空氣」；但我們的「智慧」之「水」太缺乏了。我們與其等待仙露甘霖，不如自己掘井覓泉。

當然，由於剛剛創刊，所以《今日建築》雖有企圖心，但宗旨並無明確表白。然而到了創刊週年時，《今日建築》之宗旨已經非常明確，包括有：

- 一、探討建築理論及思想，力謀建築學術之發揚；
- 二、研究並介紹現代建築新知，促使建築技術之進步；
- 三、增加社會對於建築之知識與興趣，以求國人居住情形之改善。

《今日建築》自 1954 年（民國 43 年）1 月創刊開始，便不斷的引介西方現代建築思潮、建築師與實際作品。在出刊十一期之雜誌中，《今日建築》以「大師小傳」的專欄介紹了葛羅培、柯比意、萊特以及密斯四位現代建築第一代大師，這也是台灣之建築刊物首度這麼有計劃的引介西方現代建築師，對台灣建築界是有深遠的影響的。四位第一代現代建築師在 1950 年代初正值創作高峰，許多佳作對當時在求學之建築系學生的衝擊是很大的。除了四位第一代大師外，《今日建築》也介紹了貝聿銘與阿瓦奧圖兩位第二代建築師。阿瓦奧圖是為第二代建築師中之佼佼者，其作品融合了現代精神之芬蘭文化之中，而貝聿銘這位華裔美籍建築師則是因為當時設計東海大學而於台灣建築界聲名大噪。

除了上述建築師之作品之外，《今日建築》也介紹了九個歐美建築作品，包括有法國巴黎聯合國文教大廈（Marcel Breuer 等人設計）、巴西聖保羅建城四百週年博覽會（Oscar Neimeyer 等人設計）、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Wallace K. Harrison 等人設計）、美國紐肯蘭菲利浦強生自宅（P.Johnson 設計）、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Eiffel 設計）、美國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大禮堂（Eero Saarinen 設計）、美國波士頓中心區域建設計劃（P.Belluschi 等人設計）及美國底特律通用汽車公司技術中心（Eero Saarinen 設計，隋洪林介紹）。此外該刊物也介紹了一些小住宅和美國各地新教堂以及英國哈羅鎮（Harlow）新市鎮等作品。這些作品雖然不一定是現代主義之作，但卻都具有嶄新的觀念與設計手法。

由於在前幾期之刊物所介紹之作品大多數是西方之建築，很少有本國建築師

於台灣之作，此舉甚至是美國之《Architectural Record》也來函表示關切與好奇。對於所刊出之作品多為國外現代建築，絕少刊登本國現代建築作品一事，《今日建築》在第八期以〈致讀者〉的方式提出解釋：

新建築運動在我國，的確是落後太多，原因是不勝枚舉，其中尤以我國政府及社會上，對建築本身一直在忽視不理解中，認為並非當前急務，未能積極提倡，由於此，從事建築學習者少，工作者少，少到幾乎屈指可數的程度。.... 我們應該勇敢承認，在現代建築運動裡，至少在目前，我們是不如人家的，儘管這些年來，在現代建築中，有所謂傳統（Tradition）及地域（Regional）的觀念，但那決不是保守，搬古董，固步自封之意，我們不應該在今天，再搬出幾千年以前的火藥、製紙、印刷術是我們發明的豪語，幾千年前的當時，是足以自豪的，但目前的事實，被人家趕過去太多了。「好漢不提當年勇」，我們是需要如何努力再趕過他們去的，....。

很明顯的，《今日建築》認為當時之台灣並無適合之現代建築值得介紹。或者更明確的說，負責編輯《今日建築》的建築系師生必然認為當時台灣之現代建築並不夠「現代」。這個事實可以經由該刊物所登幾個國內建築之特性中看的非常清楚。除了林澍民所設計之台中天主教主顧會女修院附設女子職業學校是布雜式的現代建築、貝聿銘設計之台中東海大學校舍興建計劃具有中國風格以及鄭定邦設計之台北浸信會懷恩堂帶有西方傳統小教堂之意象外，其他之作品包括基泰建築事務所設計之台北復興大樓、虞日鎮設計之竹東台肥第五廠辦公大樓與台北佩蒂教堂以及王大閎設計之建國南路自宅、台北松江路羅宅和台北日本駐華大使官邸都是「今日建築研究會」成員所推崇之現代主義建築。更重要的是王大閎之作經過《今日建築》之介紹而成為日後台灣建築系學生之朝聖地。

《今日建築》兩個主要的關鍵性人物，一為發行人葉樹源，另一為主要成員及撰稿人金長銘。在 1950 年代布雜餘緒仍然影響台灣建築之環境下，《今日建築》宛如一股清流，本可在台灣的建築界發生重大的影響，然而雜誌在第八期於紅底上標示黑色「八」字，致使金長銘先生離台赴美，因而於發行十一期後停刊。《今日建築》與「今日建築研究會」之壽命雖然都不長，但是它們對於台灣現代建築之催化作用卻是功不可沒的。「今日建築研究會」的會員就好像是一群默默耕耘之園丁，而《今日建築》就如同他們之苗圃，提供台灣現代建築滋長之空間。1950 年代，台灣現代建築發展之環境並不像當前這麼好，「今日建築研究會」與《今日建築》在困苦的環境中之努力實在令人敬，其精神也值得當今建築學術界學習，更是從台灣省立工學院到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早期畢業生追求現代建築最佳的寫照。

1960 年代的外籍建築師

1960 年代台灣現代建築發展過程中也曾出現外籍建築師登台設計之小插曲。台東公東高工（1960）為瑞士籍建築師達興登（J. Dahinden）所設計，整個校舍帶有非常濃厚柯布式粗獷主義之特質，清水混凝土毫不遮掩的裸露出來作為外貌之表現，而頂層教堂之處理在光線之應用及開口部之形狀比例上也都有柯布所設計之廊香教堂之影子。

新的開始 – 本地建築師之崛起

1960 年代開始，完全由大陸來台建築師包辦所有重大工程之局面逐漸起了變化。有些本地受教育之建築師在大陸來台建築師之事務所累積數年之工作歷練之後開始可以獨當一面的從事設計之工作。在這些早期本地建築師之作品中有不少仍然是受到形式主義之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吳明修所設計之台北醫學院形態大樓（1962）、教學大樓（1963）與實驗大樓（1965）等建築中所呈現出之創意與現代性就顯得特別突出。台北醫學院之幾棟建築中，材料本質之執著更清楚的呈現在清水混凝土與磚材之表現上，粗獷主義之特質甚為明顯，而機能性元素如樓梯間之強化也是擺脫形式主義之舉。另一方面，以清水混凝土有意識的去表達傳統木構架之企圖似乎也說明了建築師對於傳統建築現代化之觀點。

新淡水高爾夫球俱樂部會館是由建築師高而潘（1928 生）所設計，高而潘是一九五一年畢業於省立台南工學院（成功大學前身）建築系，也是戰後於台灣受建築教育的建築師開始於一九六〇年代積極投入台灣建築界的代表。從大環境而言，新淡水高爾夫球俱樂部會館中呈現的是一種既要順應自然的條件（包括山與水），又欲突出於自然的雙重性格。新淡水高爾夫球俱樂部會館興建的年代，基本上還是現代主義興盛的年代，空間的簡潔對於熟悉世界建築發展脈動的建築師而言，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在新淡水高爾夫球俱樂部會館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多樣的機能被安置於一個相當規整的長方型空間之中。在外貌上，新淡水高爾夫球俱樂部會館給予人感受最重的乃是其強烈的水平感與離心感，二者均是現代建築與古典建築在概念上一項非常大的差異。在此作中，離心感最主要的來源是來自於出挑的遊廊與類似懸空的正面大樓梯，此座樓梯的結構是由中央斜樑支撐一塊塊的鋼筋混凝土版所構成，即便是室內主梯也是採取同樣的結構方式。水平感是來自於二層與夾層的遊廊白水泥斬假石欄杆與屋頂的簷口線。當然除了柱樑結構外，於一層以上的非承重的牆面全面使用玻璃所造成的空體（volume）也是國際式樣的主流表現。大量開窗的作用還可將淡水的自然景緻引入室內，雖然出挑的遊廊及其較封閉的欄杆對於身處室內的人，在視線上可能是一種阻斷。封閉的鋼筋混凝土欄杆，在當時的台灣現代建築中經常的被使用，它的源頭可能是多樣的，但日本建築界的影響卻不可輕視。

從 1945 年台灣光復到 1960 年代中近二十年間，台灣現代建築之發展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而整體的主客觀環境也不是非常的理想。整個建築之發展深受政治經濟脈動之牽引，建築界本體之自主性並不高。實際的作品方面，1950 年代中所建可以成爲絕世精品的並不多，不過建築師在此種近乎建築沙漠的環境中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1960 年代經濟較爲好轉，營建活動也較多，建築師展露才華之機會也增加不少，因而建築之質與量均有所改善。另一方面，由於人才之需求，除了省立工學院（成功大學）外，其他大學也逐漸設立建築相關科系，在短短四年內就增加了五所，包括有東海大學建築系（1960）、中原大學建築系（1960）、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設計系（1962）、逢甲大學建築系（1962）及淡江大學建築系（1964）。這些新學校所培養的建築人才在 1960 年代下半起也發揮了功用，加入台灣現代建築發展的行列。